

學衡派對現代性的反思

◎ 曠新年

一 引言

1922年，在新文化運動的凱旋中，《學衡》雜誌出版了。《學衡》創刊號上刊印了孔子和蘇格拉底像，提出了「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宗旨。這與《新青年》以及新文化運動大聲疾呼地攻擊傳統和崇尚新思潮是大異其趣的。《學衡》以反對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為己任，因此而形成了學衡派。學衡派一方面向國內引介了一種現代西方思潮——新人文主義，一方面把五四截斷的傳統延伸到了現代。學衡派是對於中國現代啟蒙運動和現代化運動的最初回應，以及對於啟蒙主義與現代性的最早批評。在中國現代的激進傾斜中，他們少有同情與響應，更未形成有力的運動，而且在當時特定的時勢下被輕易地駁倒了。然而，他們的思考卻為現代思想文化的主流提供了一種反思的形式，並且實際上拓寬了新文化和現代化的思路與視景。

《學衡》創刊號提出了「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宗旨。這與《新青年》以及新文化運動大聲疾呼地攻擊傳統和崇尚新思潮是大異其趣的。

二 舊與新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的啟蒙運動。現代和傳統的對立、「新舊思潮之衝突」成為時代現象。「新舊思潮之大激戰」等名詞遍佈《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等報刊。《青年雜誌》創刊號上刊載的汪淑潛〈新舊問題〉一文典型地表明了五四思維的特點。他認為，傳統與現代、舊與新是絕對對立和無法調和的：「舊者不根本打破，則新者絕對不能發生；新者不排除盡淨，則舊者亦終不能保存。」於是，歷史必須以破壞和否定的方式連續。

學衡派的出現是在1922年，然而新文化運動和學衡派思路的分裂則可以追

溯到更早的時候。1916年，梅光迪在和胡適討論文學革命的信中就已經對胡適提出了「最後忠告」。他不僅將胡適的文學革命與整個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運動聯繫起來，而且把文學革命歸究到現代思想和哲學的基本根源：盧梭和浪漫主義。而他認為，「歐美數百年來，食盧梭與Romantic movement之報，個人主義已趨極端，其流弊乃眾流爭長，毫無真偽美惡之別」，「凡事須歸『中庸』之道」，「則文化始有進步之望耳」^①。梅光迪洞悉到胡適文學革命所包含的現代精神與哲學基礎的破壞性後果，因此，他從保守的立場出發，反對文學革命和極端自由的主張。

1917年，胡適回國領導了文學革命。與此同時，梅光迪在他輪編的《留美學生月報》第12卷上發表〈我們這一代的任務〉等英文論文。其中心思想是，當今文藝復興時代，對傳統的挑戰在所必然，然而不能以進化論否定恒常的標準。他說：「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是世界性觀念，能夠不僅與任一時代的精神相合，而且與一切時代的精神相合。我們必須了解與擁有通過時間考驗的一切真善美的東西，然後才能應付當前與未來的生活。這樣一來，歷史便成為活的力。也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希望達到某種肯定的標準，用以衡量人類的價值標準，借以判斷真偽，與辨別基本的與暫時性的事物。」^②顯然，梅光迪對歷史和傳統的理解與態度同新文化運動是根本不同的。1920年，吳宓在美國發表了〈舊與新〉和〈中國的舊與新〉，檢討中國國內的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他說，在目前中國的生活、文學和教育中，正在發生一場激烈的舊與新的衝突。他指責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撒旦式的反叛，卻名不副實地冒稱「文藝復

從雜誌簡章已可看出
《學衡》的論學與辦刊
趣向。

民國十一年一月 第一期

學衡

蔡元培題

THE CRITICAL REVIEW

No.1 January, 1922

學衡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蔽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譽，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蘊，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復不敢以見文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避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能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組織 本雜誌由散在各地之同志若干人，擔任撰述，文字各由作者個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通信 本雜誌極歡迎投稿，稿件祈寄交本雜誌總編輯收，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采登之稿，暫無報酬，至其他事務，應請與本社幹事接洽。

(五)印刷發行 本雜誌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每月一冊，曆曆月初出版，每冊售價二角五分。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分同接洽可也。

附職員表 總編輯：蔡元培 北京清華大學

興」。這種撒旦式的反叛將西方和新等同，而把中國的一切都歸入舊的範圍加以摧毀和拋棄。他認為，我們應該保存民族的與世界的傳統，這不僅因為傳統是過去智慧的結晶，而且因為它能夠調整和確定我們當前的生活^③。

梅光迪和吳宓的觀點，融合了安諾德的文化理論和白璧德的歷史透視觀點。與新文化運動對歷史和傳統的怨恨態度相反，學衡派把歷史和傳統視為「活的力量」與當代生活的有效資源。現代為變的哲學所支配，崇拜變與新，把新本身當作價值。而梅光迪和吳宓相反所尋求的恰恰是「不變」。他們不認為現代性和新本身具有價值，而是尋求普遍性的、基本性的「真正之新」。因此，他們用不同的理論化解了進化論基礎上舊與新、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緊張，而主張新舊調和融合。

三 理性與價值

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精神解放的現代啟蒙運動，其主要傾向是以理性為承諾的破壞與批判。這種「評判的態度」，是伏爾泰式的刻峭的攻擊和尼采式的狂熱的破壞精神的結合。胡適讚賞尼采對於道德的無畏的批判和他哲學中包含的破壞價值。五四瀰漫的是懷疑、批判和破壞的精神，因此傳統文化被當作國故，大家很少去積極體認傳統的有效價值和引發它們所潛藏的生命智慧。毛子水認為，「國故是過去的已死的東西」^④。而學衡派認為，傳統文化不僅不是已經死亡的國故，而且是蘊涵着意義價值與民族命脈的國粹。柳詒徵在《中國文化史》中引陳嘉異的話說：「東方文化一語，其內涵之意義，決非僅如國故之陳腐乾枯；精密言之，實含有中華民族之精神，或中華民族再興之新生命之義蘊。」^⑤

由於學衡派對於傳統的價值取向，將民族的精神和價值依託於歷史上的理想人格。這種理想人格作為民族的象徵，是整個民族的智慧、想像和情感的積澱。因此，學衡派指斥五四時代的破壞偶像的主張和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潮。學衡派出現在新文化運動徹底破壞傳統秩序，科學主義、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和浪漫主義思潮導致思想界的巨大震盪和精神迷失的時刻，這種傳統價值崩潰所引致的後果為知識分子所承載。陳寅恪曾這樣解釋王國維之死：「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⑥這種價值崩潰的精神痛苦為梅光迪、吳宓等人所親歷。吳宓說：「年來吾國青年思想解放，頓覺舊有全非，乍入於一種精神的無政府狀態。……學術思想之淆亂，精神之迷離痛苦，群情之危疑惶駭，激鼓蕩，信仰全失，正當之人生觀不易取得。」^⑦值得注意的是，學衡派的基本成員都是學貫中西的學術知識分子，他們為了克服因傳統的崩潰和歷史的斷裂所形成的價值真空造成的時代痛苦，努力在紛紜紊亂中尋求秩序和穩定，在急劇流變中體認絕對和真實，重建價值和信仰，為精神和民族尋找安身立命之所。他們不滿於新文化運動對現代的理解，積極為傳統

吳宓指責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撒旦式的反叛，卻名不副實地冒稱「文藝復興」。這種撒旦式的反叛將西方和新等同，而把中國的一切都歸入舊的範圍加以摧毀和拋棄。

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辯護，通過對於傳統的現代闡釋，建立現在與過去的聯繫，疏解現代與傳統的對立，實現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順利轉型。

四 學衡派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

《學衡》第3期上譯載了白璧德應邀為中國留美學生所作的講演〈中國和西方的人文教育〉。白璧德批評了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進步觀念，以及盧梭的浪漫主義和培根的功利主義兩種傾向。針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白璧德指出，中國一方面需要吸收西方近代文明和科學，但更重要的是維持傳統人文主義的核心精神。吳宓為譯文寫了長篇按語，倡導人文主義思想。學衡派認為，新文化運動破壞中國傳統已經走向了極端，而對西方文化的輸入擇取又充滿謬誤。因此，學衡派起而辨正新文化運動的理論主張。

吳宓認為，新文化運動「於中西文化所必當推為精華者，皆排斥而輕鄙之，但採一派一家之說，一時一類之文，……此於造而新文化，融合東西文明之本旨，實南轅而北轍。」^⑧劉伯明批評當時風行的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將西方文化簡約化的做法。「其謂西洋文化，通是科學與德謨克拉克，厥後又縮小範圍，而以希臘羅馬及近世文化為限，中世文化不在此範圍以內。不知中世文化，為西洋文化緊要元素之一，而希臘文化又與中世文化不同也。」^⑨於此可見，以現代性來統括西方文化，成為當時對於西方文化的普遍誤解。在五四時期，民族危機使人們對於傳統徹底失去了信心與敬意。嚴復譯述的進化論思想加劇了當時民族心理的緊張與畸變。同時，反過來民族的焦灼心理又加劇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緊張。五四新文化運動全面否定傳統，急功近利與片面地選擇西方近代文化，饑不擇食地攫取最新與流行的理論，有意忽略了西方文明的源遠流長。在新文化運動高潮中，梅光迪發表了〈自覺與盲從〉，他認為，中國思想界領袖「其變遷性乃勝於保守性」，社會思潮急遽變換，思想淺陋不清。所謂西方思想多販自日本，不免間接之弊。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對於本國舊文明和制度缺乏了解，另一方面對於西方文明缺乏研究與取捨能力，徒知盲從世界潮流。

在新文化運動高潮中，梅光迪認為，中國思想界領袖「其變遷性乃勝於保守性」，一方面對於本國舊文明和制度缺乏了解，另一方面對於西方文明缺乏研究與取捨能力，徒知盲從世界潮流。

五四以來，對於現代性的追求，對新的崇拜與進化論的觀念一直左右着中國思想界。新成為價值標準，不斷變革，不斷否定，不斷求新，不斷翻新擠兌，一切時尚迅速成為過眼煙雲，最終導致歷史相對主義和價值標準的喪失。學衡派試圖糾正新文化運動「一味趨新之流弊」^⑩，維護和肯定傳統思想文化的基本思想和中心觀念的普遍性價值。吳宓批評說：「進步之說，為今世最大之迷信，……信此說者，不求本質之價值，而惟務新奇。」^⑪胡稷成認為：「今之傾慕西方文明，徒事仿效者，大都不識西洋文明之源泉，兩千年來蛻變之形迹，及其將來進行之方向。故僅目眩心惑於片斷的暫時之物質文明。我國學術界，苟欲利用西洋之文明，以促進精神文明之發展，則於西洋文明之全體，不可不有極明瞭之觀念也。」^⑫《學衡》雜誌以及《大公報·文學副刊》，以古代希臘和近代文藝復興為中心，廣泛介紹了古希臘以降西方各種思想文化和文學流

派，對西方文化和文學具有了歷史的、縱深的和整體的認識，在方法上體現了白璧德歷史透視的觀點，在精神上又歸依於人文主義和古典主義標準。五四新文化運動主要接受了西方近代啟蒙主義反傳統的理性主義傳統，而學衡派在啟蒙主義思路之外引入了古代希臘和近代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傳統，古代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特別是現代安諾德和白璧德的思想。

學衡諸子洞知西方現代文明的弊害，他們認為新文化運動在引進西方近代文明的過程中，西方文明的悲劇亦將由此重演。他們像白璧德一樣把盧梭當作最主要的敵人，並對現代性提出激烈批評。胡先驥說：「文化史中最有價值者，厥為歐洲之文藝復興運動。至若盧梭以還之浪漫運動，則雖左右歐洲幾二百年，直至於今日，尚未有艾。然卓識之士，咸知其非，以為不但於文學上發生不良之影響，即歐洲文化近年來種種罪惡，咸由此運動而生焉。」^⑬嚴復譯介英國功利主義思想，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思想先驅。而胡先驥也把中國現代的政治腐敗、道德淪喪，追溯到光緒年間嚴復的學術翻譯和康有為的政治變革。中國現代化的「始作俑者」嚴復，這時也轉而批評近代西方文明，重新認同儒家思想。當中國醉心於「全盤西化」的時候，梅光迪卻提出了相反的問題：西方覺醒了嗎？他說：「看來救治當今商業統治的罪惡的良藥，……在於將學者置於頂層而商人置於底層這種中國過去社會結構觀念的重新肯定。」^⑭在梅光迪的保守立場看來，現代卻恰恰是需要克服的病態，因此需要重新肯定傳統秩序的價值。他們認為，真正的進步不在於道德禮教和秩序制度的破壞摧毀，而在於人性修養和道德進步，提倡人文教育，養成君子。針對新文化運動對傳統的破壞，他們維護傳統的價值，針對科學主義和浪漫主義思潮，高揚道德理性。

學衡諸子洞知西方現代文明的弊害，他們認為新文化運動在引進西方近代文明的過程中，西方文明的悲劇亦將由此重演。他們像白璧德一樣把盧梭當作最主要的敵人，並對現代性提出激烈批評。

五 學衡派的文學觀

吳宓認為，文學批評不應自限於藝術批評，而是「由文學批評，進而為政治社會道德宗教之批評」^⑮。在五四時期，對文學現代性的渴望中，追求藝術的獨立性，推崇獨創和個性，成為共同的取向。因此，新文學和學衡派在文學觀念上形成了明顯對立。

五四時期，進化論成為普遍的觀念，根據對於文學現代性的理解，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和新浪漫主義(現代主義)被視為不同的進化階段和價值等列。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提出了不斷進化的、「不肖子」的文學史觀。梅光迪指出，文學進化論是已經過時的流俗的錯誤^⑯。吳宓認為，文學發展為積聚的而非遞代的，「吾人今日之文學財產，乃各時代各國各派文學作品之總和」^⑰。文學不是按現代性的標準直線進化，而是圍繞着一個中心不斷擴展。傳統與現代不是彼此對立和否定的，而是相容共存的。

正如現代性在現代取代傳統成為一種絕對價值，模仿也像傳統一樣在現代成為了一個否定意義的字詞。模仿有兩層基本含義。首先，古典主義理論建立在亞里士多德《詩學》的模仿概念上。模仿承認一個客觀世界的存在，因此同表現論對立。五四時期，隨着文學概念的轉換，文學認識論上發生了一場根本變

革。文學和心靈、自我、靈感、情緒、表現、宣洩等概念相關聯，成為對於傳統的反叛。因此，文學革命蘊藏了一場浪漫主義運動。對模仿的反叛，也就是對於歷史傳統的反叛，對於標準、規範以及秩序的反叛，最終導致中心權威的崩解、批評判斷的癱瘓和意義的渙散。胡先驕在〈文學之標準〉中批評浪漫主義推崇自我和情感，推翻理性和標準。學衡派把浪漫主義以還所有違離了古典主義標準的現代性文學，均劃歸浪漫主義範疇。第二義的模仿是新古典主義狹義的模仿古典作家作品。在文學革命的反叛與崇新之中，學衡派有意強調此意義的模仿。在〈評嘗試集〉中，針對胡適「八不主義」中「不模仿古人」的誠條，胡先驕肯定模仿「垂範於後世」的經典作品的重要性。在〈論新文化運動〉中，模仿甚至成為了吳宓考察文學史的一個最基本的概念。他認為，傑出的作家都模仿過前人，後進的民族模仿文學發達的民族，甚至文學的發展也由模仿的變遷所引起。中國的文學革命也不離模仿，只是模仿的對象由古代變成了現代，由本國轉向了外國^⑧。

現代性就是要和過去、傳統作徹底的決裂，因此反對模仿而推崇創新。學衡派對模仿的解釋，是和他們對傳統的理解相關的。學衡派反對文學革命完全切斷傳統和廢棄舊形式的做法，他們認為文學具有傳統連續性。吳宓認為，「以新材料入舊格律，合浪漫之感情與古典之藝術」，為文學創作「唯一之正途」^⑨，中國現代文學必須吸收西方文學新的內容與反映時代變化，但更主要的是文學傳統的新的延續。他認為不僅傳統的核心內容在現代不斷復現和發展，而且舊形式也依然具有活力。「今日中國文字文學上最重大急切之問題乃如何用中國文字，表達西洋之思想，如何以我所有之舊工具，運用新得於彼之材料。」^⑩我們在提倡文學現代化的時候往往進入了一個誤區，即和傳統進行決裂而不是進行有意義的更新。

五四時期，隨着文學概念的轉換，文學認識論上發生了一場根本變革。文學和心靈、自我、靈感、情緒、表現、宣洩等概念相關聯，成為對於傳統的反叛。因此，文學革命蘊藏了一場浪漫主義運動。

六 學衡派的文化使命意識

安諾德在《文化與無政府》等書中批評了現代商業文明。他洞知現代社會宗教力量的式微，於是將社會的整合和精神的發展託命於文化，而文學將居於核心，取代宗教與哲學的功能。他稱詩歌為人生的批評，並認為當代歐洲最缺乏的正是批評。批評的目的就是通過對優秀的思想文化的研究，去接觸人生的真理與確定價值規範。實際上，安諾德對批評的推崇和文化的重視，也就是要通過文化來維持和傳播傳統和權威的普遍性價值，反對浪漫主義和啟蒙主義對理性和獨創的崇拜。安諾德是尼采的同時代人，他死於尼采瘋狂的前一年。尼采以「快樂的科學」宣告了上帝、真理和價值的死亡，導致了現代主義自我的傲慢狂妄和無限超越，以及現代社會精神分裂症式的碎裂。安諾德說他自己「站在兩個世界之間，一個已經死亡，一個卻無力誕生」。他體認到傳統的死亡，中心的傾覆，價值的崩解，社會的失序和靈魂的分裂，努力為現代世界的渙散找尋黏合與秩序，收拾西方文明的殘片，重構精神與價值。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盧梭和尼采以及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風靡了中國知識界，而安諾德則從沒

安諾德的文化理論深刻地影響了學衡派。



有獲得過傾聽。這也是時勢所使然的。1922年，《東方雜誌》為安諾德百年誕辰出版了紀念專號。胡夢華說：「現在的中國急需要像安諾德一樣的一個良醫，對於中國時下各種病症下以藥石，把有病的中國人，從舊的頑固裏、新的偏激裏救出來，使得他們做一個健全的、中庸的新中國人。」^②安諾德試圖調和科學與人文、傳統與現代的衝突，為現代世界重新尋求秩序。

安諾德的文化理論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學衡派。學衡派試圖通過文化來重建傳統與秩序，他們明顯地具有文化的自覺和學術的使命感。五四時期，學衡派認為，當務之急乃在建立嚴肅、純正和權威的學術批評，以確立學術的標準和價值的規範。劉伯明〈學者之精神〉、〈再論學者之精神〉，胡先驌〈論批評家之責任〉，梅光迪〈論今日吾國學術界之需要〉等文，對學術界以及教育界的功利主義潮流，「立言務求其新奇，務求其偏激」的態度^③，群眾運動的方式，以及浮淺混亂的狀況加以批評，主張對學術應有徹底和獨立的研究。胡先驌指出：「批評家之責任，為指導一般社會，對於各種藝術之產品，人生之環境，社會政治歷史之事迹，均加以正確之判斷，以期臻於至善至美之域。」^④批評的根本在於判斷，其目的在建立知識的秩序和價值的等級。他們認為，新文化運動在打倒傳統，破除權威，追求解放與平等的過程中，其實使真正的批評精神

學衡派試圖通過文化來重建傳統與秩序，他們明顯地具有文化的自覺和學術的使命感。他們認為，當務之急乃在建立嚴肅、純正和權威的學術批評，以確立學術的標準和價值的規範。

遭到了損害。梅光迪指出：「今日吾國學者，妄以平民主義，施之於天然不平等之學術界，雅俗無分，賢愚夷視，以期打破智識階級。」平民主義的流行，知識階級的毀滅，使權威墜失，價值混亂，社會失序。他感嘆學術界「呈幼穉紛亂之象，標準未立，權威未著，不見通人大師」。他認為，中國「今日第一需要，在真正學者」。「真正學者，為一國學術之領袖，文化之前驅」^{②4}。他們反對啟蒙主義的打倒權威和傳統。他們認為，需有一批知識權威即所謂「通人大師」建立知識的秩序和價值規範，引導社會健康發展，這樣，文化學術才具有穩定性、延續性和建設性，也只有這樣，社會才能有序地和良性地發展。這就是學衡派的文化理想。因此，學衡派對於文化建設和發展的態度與設想，和新文化運動是很不相同的。

現代性的本質就是和過去的決裂和對歷史的絕對遺忘，而追求和達到一種純粹「當前的」生活。盧梭和尼采認為，人類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學會「遺忘」。因此，他們對於歷史、傳統、秩序、制度和文明是反感和否定的。也因此，在他們看來，傳統和現代是必然對立的。學衡派認為，人和動物的本質區別在於文化，在於歷史和記憶。人類的文化傳統和價值空間使人類超越了動物的生存。因此，人類不能毀棄文化傳統的象徵符號世界。學衡派不贊同用破除歷史和傳統的方法來建立新思想。當時有人在批評新文化運動的激進主張時說：「今日之主張推倒一切舊習慣者，實因其心意中並未發生新思想之故。」^{②5}非理性行為的發生，正是因為尚沒有產生真正的新思想，正如工業革命初期路德分子盲目地搗毀機器，是由於當時社會主義的新思想尚未發生。

五四時期，由於學衡派對於歷史、傳統以及現代這些概念，和新文化運動在理解上有差異，使他們在東西新舊文化的衝突中，找尋到一種不同的應付舊與新、過去與現在、傳統與現代的方式。學衡派認同傳統和權威，擁護秩序與制度，強調歷史和傳統的連續性。吳宓說：「今欲造成新文化，則當先通知舊有之文化。蓋以文化乃源遠流長，逐漸醞釀孳乳煦育而成，非無因而遽至也。」^{②6}學衡派並不反對新文化這一名詞。他們和新文化運動的分歧在於，學衡派不僅認為傳統和現代、舊與新不是對立的，而且主張疏通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並且強調傳統的重要價值。因此，他們不是把新和現代當作絕對的標準，否定和推翻傳統，相反是主張積極地從傳統中認取有效的價值。學衡派的目標在「一則欲輸入歐美之真文化，一則欲昌明吾國之真文化」^{②7}，以此建立「真正新文化」^{②8}。他們一面注意文化傳統自身內在的發展主線，呵護傳統文化的生命根基，積極體認其有效價值：一面立足於文化傳統的本體之上，積極傳譯擇取西方文化。他們的最終目標與最高理想是超越文化限界，達成世界性的共同文化。因此，他們從世界範疇內來重新發現和肯定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吳宓說：「孔孟之人本主義，原係吾國道德學術之根本。今取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下之學說相比較，融合貫通，擷取精華，再加以西洋歷代名儒巨子之所論述，熔鑄一爐，以為吾國社會群治之基。如是則國粹不失，歐化亦成。所謂造成新文化，融合東西兩大文明之奇功，或可企收。」^{②9}

學衡派的特點在聚合了現代一群保守的學術知識分子，他們以強烈的文化意識和文化使命感，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思想氛圍和思想路徑。《學衡》雜誌曾連

學衡派和新文化運動的分歧在於，學衡派不僅認為傳統和現代、舊與新不是對立的，而且主張疏通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並且強調傳統的重要價值。

載過柳詒徵和陸懋德兩種《中國文化史》著作。吳宓所景仰的史學家陳寅恪在其歷史研究中，總是深蘊着濃烈的文化意識，將文化命運視為民族生命的本質，他對文化傳統懷有深厚的敬意和同情的了解的態度。對傳統和現代的關係的認識體現在「新瓶裝舊酒」的觀點中。他認為，中國未來必然是中國文化本質的發揮、擴展和創造性轉化。因此，新文化的輸入不在於切斷根除傳統文化，而是相反，外來文化必須在傳統文化中發現生命淵源和尋求支援，才會具有真實的生命。現代新文化必須是文化傳統的合理引伸和發展，這樣，其文化新機才是建設性的。

七 結 語

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被迫的反應，也成為民族的焦慮。五四新文化運動領導者如胡適、魯迅等人甚至認為，為了中國的現代化即民族生存的需要，應該毫不猶豫地拋棄可能成為現代化障礙的民族文化。他們認為傳統和現代是不能相容的，現代化必須以推翻和清除傳統的秩序制度和價值系統為前提。這就是五四時代所謂「根本解決」的思路。民族焦慮投射在傳統與現代對立這種緊張之中，也因此，中國的現代化設計和實踐缺乏一種健全的心態和清明的理性。對現代性的極端崇拜開啟了五四疑古思潮，使傳統遭受了毀滅性打擊。因此，聞一多說：「當然一提到『現代』兩字，中國人的腦筋裏必浮現着一幅有趣而驚人的圖畫：青面獠牙，三首六臂，模樣怪到不合常理。」^⑩胡適曾經思考過新的文化如何能夠適應的問題，指出中國接受新文化不能採取突然替換的方式。他認為，解決新舊文化之間的衝突，「唯有依靠新中國知識界領導人物的遠見和歷史連續性的意識，依靠他們的機智和技巧，能夠成功地把現代文化的精華與中國自己的文化精華聯結起來。」^⑪但是，在中國現代化的實踐中，卻是取了和傳統突然斷裂的方式，不斷的震盪結果使現代化失去了合理的基礎。因此，學術知識分子的任務，就是以歷史連續性的意識，和對傳統的從同性的意識，自覺地引導傳統進行合理的現代價值轉型與解釋，闡發傳統的有效價值，疏解傳統與現代的緊張。

五四時期，西方的衝擊導致「全盤西化」的提出。同時，儘管學衡派以一種極端的姿態為傳統辯護，可是學衡派對傳統的體認已不再是純粹傳統的。五四時期思想的兩極都無法自外於現代而都立志於「世界性」的思考。梅光迪和吳宓恰恰是通過西方的情節需要，和新人文主義的敘述形式來發現傳統的價值的。學衡派啟動了現代新儒學以現代來闡釋傳統儒家思想，以西方來觀照和發掘傳統的內在智慧和價值的資源，在現代和世界的框架內思考傳統的存續性問題。40年代，李長之提出了「迎中國的文藝復興」的命題。他說：「真正發現一種古代文明的完全真相也許是不可能的，只是在這發現之際，就可以發現一種發現者的人格了。就是這種發現者的人格，可以形成一種運動，可以產生很大的價值。因此，了解包含一種精神上的共鳴，了解即是創造。」^⑫從反傳統到「接着」傳統，學衡派是一個轉捩點。

學術知識分子的任務，就是以歷史連續性的意識，和對傳統的從同性的意識，自覺地引導傳統進行合理的現代價值轉型與解釋，闡發傳統的有效價值，疏解傳統與現代的緊張。

註釋

- ① 梅光迪致胡適信(1916.7.24),〈有關胡適提倡新文學的幾則史料〉,《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4期。
- ② Mei Kuang-ti: "The Task of Our Generation",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2:3 (January 1917). 此處用侯健譯文。
- ③ Wu Mi: "Old and New in China",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6:3 (January 1921).
- ④ 毛子水:〈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訂誤〉,《新潮》2卷1號。
- ⑤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學衡》72期。陳嘉異:〈東方文化與吾人之大任〉,原載《東方雜誌》18卷1、2號。
- ⑥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⑦ 吳宓:〈我之人生觀〉,《學衡》16期。
- ⑧⑩⑫⑭ 吳宓:〈再論新文化運動〉,《留美學生季報》8卷4號。
- ⑨ 劉伯明:〈評梁漱溟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學衡》1卷3號。
- ⑪ 吳宓:〈《柯克斯論進步之幻夢》按〉,《學衡》27期。
- ⑫ 胡稷成:〈敬告我國學術界〉,《學衡》23期。
- ⑬ 胡先驕:〈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學衡》18期。
- ⑭ Mei Kuang-ti: "Is the West Awakening?", *The Nation* 122:3172 (April 1926).
- ⑮ 吳宓:〈孔教之價值〉,《國聞週報》3卷40號。
- ⑯ 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學衡》1期。
- ⑰ 吳宓:〈文學與人生〉,《大公報·文學副刊》4期。
- ⑱ 吳宓:〈論新文化運動〉,《留美學生季報》8卷1號。
- ⑲ 吳宓:〈評顧隨無病詞味辛詞〉,《大公報·文學副刊》73期。
- ⑳ 吳宓:〈馬勒爾白逝世三百年紀念〉,《大公報·文學副刊》40期。
- ㉑ 胡夢華:〈安諾德評傳〉,《東方雜誌》19卷23期。
- ㉒㉓ 胡先驕:〈論批評家之責任〉,《學衡》3期。
- ㉔ 梅光迪:〈論今日吾國學術界之需要〉,《學衡》4期。
- ㉕ 詹父:〈何謂新思想〉,《東方雜誌》16卷11號。
- ㉖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最近之文化〉,《學衡》72期。
- ㉗ 余生:〈民族生命與文學〉,《大公報·文學副刊》197期。
- ㉘ 聞一多:〈《現代英國詩人》序〉,季鎮淮主編《聞一多研究四十年》(清華大學出版社,1988)。
- ㉙ 胡適:《先秦名學史》,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下冊(中華書局,1991),頁772。
- ㉚ 李長之:《迎中國的文藝復興》(商務印書館,1946),頁8。

曠新年 1963年出生於湖南湘鄉。1980年考入武漢大學。1992年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現為該校中國現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